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成因与应对*

在主要国家中，谁能够较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就可在 21 世纪大国博弈中占据优势。“养儿防老”曾经是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变量，但在市场化改革和人均收入水平提升背景下，养老金融和医疗陪护产业的发展使“养儿防老”必要性下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则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要遏制老龄化趋势，关键需依靠政府发挥“集体理性”，提高生养子女的净收益，必要时可直接发放生育补贴。政府不能有效作为，是发达国家陷入老龄化困境的重要原因。我国具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显著制度优势，随着政策关注度提升，未来我国可能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最好的国家。

中银研究产品系列

- 《经济金融展望季报》
- 《中银调研》
- 《宏观观察》
- 《银行业观察》
- 《人民币国际化观察》
- 《国别/地区观察》

作者：赵廷辰 中国银行研究院
电话：010 - 6659 1558

签发人：陈卫东
审稿：周景彤 李佩珈
联系人：刘晨
电话：010 - 6659 4264

* 对外公开
** 全辖传阅
*** 内参材料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成因与应对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能否较好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动力的关键变量，是影响 21 世纪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2021 年 5 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人口老龄化问题再度引起我国各界关注。

一、现状：我国已出现人口老龄化趋势

人口老龄化根源于低生育率。一般认为，如果总生育率¹低于 2.1，新生人口便不足以弥补父母数量。如果总生育率持续低于 2.1，即使总生育率能够保持稳定，出生率²也会逐年降低，将会出现总人口增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老龄人口占比上升等三个特征，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我国总生育率于 1992 年跌破 2.1（1.98），1995 年后长期维持在 1.6-1.7。近年来，许多研究指出我国已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印证了这一判断。当前，我国人口现状呈现出老龄化趋势下的三个特征。

第一，总人口增速进一步减缓。2020 年我国总人口为 14.12 亿人，2010-2020 年间总人口增长了 5.38%，低于 2000-2010 年（5.84%），明显低于 1982-1990 年（12.45%）和 1990-2000 年（11.66%）。

表 1: 从人口普查结果看我国总人口变化趋势

普查年份	总人口（万人）	较上次普查的人口增长率（%）
1953	59,435.00	-
1964	69,458.00	16.86
1982	100,818.00	45.15
1990	113,368.00	12.45
2000	126,583.00	11.66
2010	133,972.00	5.84
2020	141,178.00	5.38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¹ 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简称总生育率，指该国或地区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

² 粗出生率（Crude Birth Rate, CBR）简称出生率，指该国或地区人口在一定时期（通常为一年）活产婴儿数与同期总人口数量之比，一般用千分比表示。

第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1964年后，我国15-64岁年龄段（此年龄段一般被视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持续攀升，自1964年的55.75%升至2010年的74.53%，“人口红利”成为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然而，本次普查发现，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但首次下降，而且降幅较大（-5.98%），这无疑将对未来经济增长带来挑战。

表2：我国各年龄组人口占比及趋势（单位：%）

年份	各年龄组人口比例:15-64岁	较上次人口普查的变化	各年龄组人口比例:65岁及以上	较上次人口普查的变化
1953	59.31	——	4.43	——
1964	55.75	-3.56	3.57	-0.86
1982	61.50	5.75	4.91	1.34
1990	66.74	5.24	5.57	0.66
2000	70.15	3.41	6.96	1.39
2010	74.53	4.38	8.87	1.91
2020	68.55	-5.98	13.50	4.6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老龄人口占比显著提升。从前几次普查结果来看，我国65岁以上（一般被视为老龄人口）人口占比虽然持续提升，但每十年间增幅一般不超过两个百分点。但据本次普查，老龄人口占比不仅首次突破10%（达到13.5%），而且增幅高达4.63个百分点，显示人口老龄化正在加速。

二、我国生育率降低的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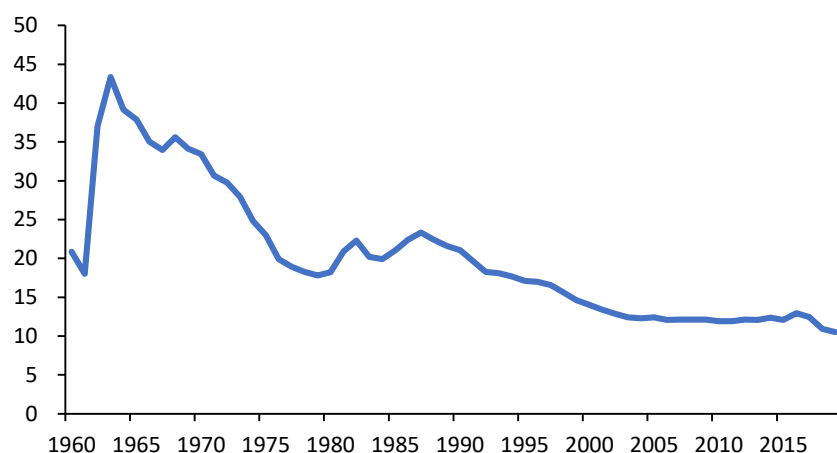
（一）两种常见观点

关于我国生育率降低的成因有多种看法。有观点认为，根源在于我国长期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由2015年的12.07%升至2016年的12.95%，但此后又逐年降至2019年的10.5%。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已不是当前影响该问题的根本原因。未来，即使完全解除生育限制，也难以彻底扭转老龄化趋势。

另有观点认为，我国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主要是因为房价高、工作压力大、子女抚

养成本高。这些因素无疑影响了大城市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但为什么在房价较低、工作压力较轻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同样出现了出生率的持续下滑？另外，从我国历史来看，生养子女成本高并不必然导致低生育率。例如，过去六十年间，我国人口出生率最高的时间段为1962-1965年（每年不低于37‰），但该时期人民生活非常困难。当时生养子女的经济成本虽然绝对值较低，但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并不低，人们即使缺衣少食，生育意愿依然较高。

图1:我国人口出生率（单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二）“养儿防老”必要性降低是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人口老龄化的根源在于生养子女的净收益下降，导致年轻人的生育意愿降低。年轻人之所以愿意生养子女，在于生养子女的收益大于成本。收益超过成本越多，意愿越强，反之越弱。

生养子女的收益有哪些呢？可从文化角度来分析：实现家族延续，传宗接代。也可从心理角度来看：获得家庭幸福感，享受天伦之乐。各国情况各异，就我国而言，“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可能是影响居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年轻父母在生养子女过程中，需要付出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这可以视为一种对金钱和人力资本的储蓄；子女长大成人后，又会付出金钱和时间来赡养年迈的父母，这可视为对父母当年所储

蓄金钱和人力资本的偿还。

“养儿防老”并非唯一养老方式，但在我国封建时期，金融产品匮乏、金融业存在严重道德风险、纸币通货膨胀率高，年轻人无法将其收入借助金融工具妥善储蓄。此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医疗陪护产业，老人难以通过市场购买医护服务。在此情况下，“养儿防老”便成为最佳的人力资本储蓄手段和养老方式。因此，年轻人往往具有很强的生育意愿。

“养儿防老”模式曾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多子多福”（婴幼儿长大成人概率低，多生子女才能确保存活数量）、“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无法赡养亲生父母，儿子结婚后却可以与儿媳共同为公婆养老）等观念深入人心。此外，社会价值观高度强调“孝”的重要性。要求子女孝敬父母，可视为一种对父母储蓄的“刚性兑付”。当年迈父母无力约束年轻子女时，通过道德准则、社会舆论和法律规定来督促子女赡养父母。如果没有这种“刚性兑付”，生养子女的净收益就会下降，年轻人就不愿生养子女，人口繁衍、社会稳定的根基就会动摇。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政策鼓励下，我国人口出生率在1963年一度达到了43.37%的高峰。此后，虽然没有执行全国性的生育限制政策，出生率却逐年下降，到1979年降至17.82%，16年间锐减了25个百分点。这与当时我国稳步建立起全国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直接相关：由于国家负责养老，“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出生率止跌回升，从1979年17.82%的阶段性低谷，逐年上升至1982年的22.28%，仅3年升高4.46个百分点。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1983年出生率降至20.19%。但即使在强力政策约束下，到1987年出生率反弹至23.33%。这一反弹是惊人的，显示出在改革开放浪潮下，20世纪80年代居民对未来国家还能否负责养老出现了顾虑，“养儿防老”意愿升高。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又逐年降低，1995年后总生育率基本稳定在

1.6-1.7。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已落实到位，但也说明居民逐渐失去了 80 年代那样强烈的生育意愿，以至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出台后，人口出生率回升有限。具体来看，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国逐渐出现了由全国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共同组成的养老保险体系；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通胀率保持稳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发展迅速，居民可以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投资股票和购买房地产等方式储蓄家庭财富；第三，各类医疗陪护产业蓬勃发展；第四，由于工资水平较快提升，减少工作时间用以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幅升高；第五，人口流动加快，更多年轻人与父母身处异地，养老不能靠子女。上述五点因素，均与我国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密切相关。在这些因素综合影响下，“养儿防老”的必要性再度下降，我国居民整体的生育意愿逐渐降低，千百年来形成的“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观念迅速瓦解，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三）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的反向变动关系不是我国所独有的

虽然在许多国家，“养儿防老”不一定是决定居民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生育率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是普遍存在的。具体而言，在排除战争、饥荒、国家版图变化等可能导致人口快速变化的因素后，可以观察到三种现象³。

第一，穷国出生率高于富国。以 1992 年和 2019 年为例，无论从出生率还是人口增长率来看，低收入国家高于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又高于高收入国家（见表 3）。

³ 本文使用 1992-2019 年的世界银行数据。1992 年后全球大规模战乱较少发生，主要国家再未出现大的合并或分裂，且多走上了以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道路。2019 年为数据库涵盖的最新统计年份。以人均 GDP 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反映生育水平。

表 3: 人均 GDP、出生率与人口增长率对比

	指标	1992	2019
高收入国家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20689.3	44462.5
	出生率 (‰)	13.7	11.1
	人口增长率 (%)	0.6	0.7
中等收入国家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922.0	5561.9
	出生率 (‰)	25.8	17.7
	人口增长率 (%)	1.7	1.0
低收入国家	人均 GDP (现价美元)	299.6	810.1
	出生率 (‰)	44.2	33.8
	人口增长率 (%)	3.0	2.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第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出生率会逐渐降低。这一现象在市场机制发育充分的发达经济体中表现的尤为突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新加坡等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历史上同样采取“养儿防老”模式的经济体，在实现经济腾飞后似乎人口出生率比欧美经济体还低。这一现象对我国是否有参考意义？这是否可说明“养儿防老”动机一旦失去，相比欧美经济体，儒家文化圈经济体的生育率会更低？这一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表 4: 部分发达经济体出生率 (单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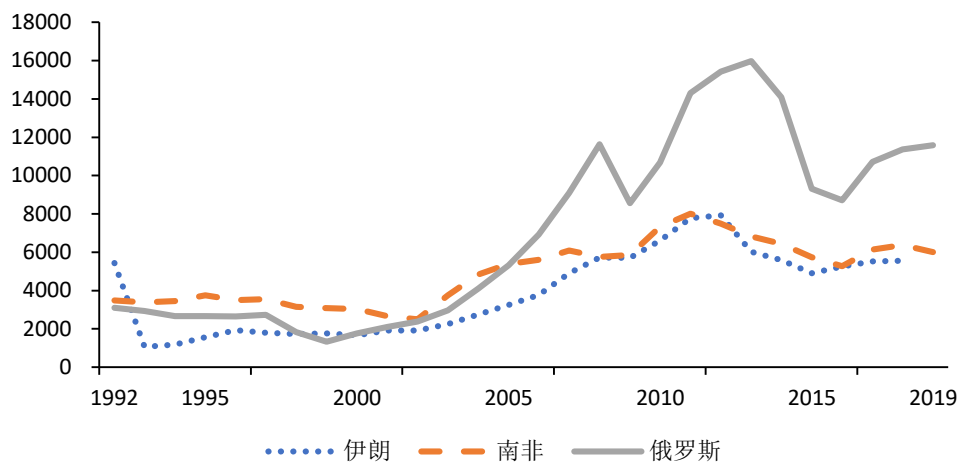
年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丹麦	德国	俄罗斯	法国	芬兰	荷兰	意大利	英国	加拿大	美国
1992	12.30	15.53	16.70	9.80	16.80	13.10	10.00	10.70	13.10	13.20	13.00	10.00	13.60	14.70	15.80
1995	11.20	15.50	15.70	9.54	15.60	13.30	9.40	9.30	12.80	12.30	12.30	9.20	12.60	12.60	14.60
2000	8.10	13.76	13.50	9.40	13.70	12.60	9.30	9.80	13.30	11.00	13.00	9.50	11.50	10.70	14.40
2005	8.40	9.06	9.00	8.41	10.20	11.90	8.30	11.00	12.80	11.00	11.50	9.60	12.00	10.60	14.00
2010	12.60	7.21	9.40	8.50	9.30	11.40	8.30	14.00	12.90	11.40	11.10	9.50	12.90	11.10	13.00
2015	8.20	9.10	8.60	8.00	9.70	10.20	9.00	12.80	12.00	10.10	10.10	8.00	11.90	10.70	12.40
2019	7.00	7.53	5.90	7.00	8.80	10.50	9.40	9.80	11.20	8.30	9.70	7.00	10.70	9.90	11.4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第三，一国如出现经济停滞，其出生率可能保持相对稳定。近三十年来，全球经济整体处于不断上升过程中，出生率下降是普遍趋势，但也可以找到几个特例。例如，伊朗、南非和俄罗斯。这些国家均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DP 出现了显著起伏。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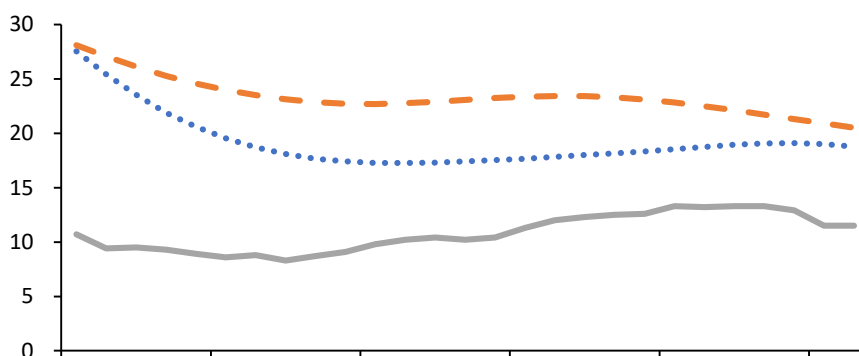
南非出生率出现了下降，但在 2002-2009 年间持续回升；伊朗出生率一度下跌，但在进入 21 世纪后企稳回升；俄罗斯出生率则稳中有升。

图 2: 伊朗、南非和俄罗斯人均 GDP (单位: 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图 3: 伊朗、南非、俄罗斯出生率 (单位: ‰)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云报告?reportId=1_36045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

云报告
https://www.yunbaogao.cn